

追求真理 不断前进

杨西孟

(一)

用孟和先生自己的话说，人“是时代的产物”^①。孟和先生就是随着时代的前进而波浪式地前进的——从“五四”运动时期在《新青年》发表文章到从事中国社会的调查研究，再到迎接解放战争的胜利，并为人民立了功。

按照孟和先生一贯强调调查研究的精神，我在写本文时，也对他的事迹，特别是他的著作，作了一些调查研究（过去只偶然作过），以便进一步从历史的角度理解他是怎样前进的。

先从“五四”运动时期说起。

“五四”运动时期的两面旗帜是民主与科学。我们就孟和先生在这个时期以前和随后的著作，来看他对民主与科学的思想认识所发生的重大变化。

由孟和先生所著《社会与教育》一书中，可以看出陶先生在“五四”运动时期以前的（但后来改变了的）思想和认识。如他自己在该书1934年第一版的序言中所说，“至于本书的不使人满意，有完全改作的必要，著者十分感谢。但这个只好俟诸异日了”。我们在这里之所以引用该书中的话，是为了反映陶先生后来如何前进，而不是算他早先思想的旧帐。这是从历史的角度和发展的观点来理解陶先生。

在那本书里，关于民主，陶先生写道，“民治的根本要义有四，即友爱，平等，自由，社会效率四种。”^②对于科学，特别

^① 《社会科学》杂志第一卷第一期（1930年3月）

^② 陶孟和，《社会与教育》，1934年8月第一版，第217页。

是社会科学，书中写道，“社会现象，如上所述，是复杂的。各种要素的变化繁夥，所以现象的变迁，因果的关系最难测定。即使能测定出规律来，那也是或然律。”^①又关于社会学写道，

“现在社会学的研究可分为四部分：一、社会之起源。……二、社会之演化。……三、社会组织。……四、社会改良。……”^②这里在社会组织中不讲阶级。

现在我们来看在“五四”运动时期孟和先生在《新青年》里发表的文章中对于民主与科学的观点比从前有多大的变化和前进。在《我们政治的生命》一文中，他写道，“七年以来的民国，是没有人民的民国，……所以执政者才造出这许多政治的罪恶。……转瞬就是新岁，我们人民岂不可以……使八岁的民国，变成人民的国家，民治的国家么？”^③在《欧美之劳动问题——一九一九年在欧洲时所见》一文中写道：“因为工业革命后，成就了现今的资产制度，都把人类分为两种相对抗的阶级。”“这样看起来，劳动是工业国家的生死问题。（中国提倡实业的都说可以使国家富强。我们看了欧美的经验，富强的并不是国家，实在是国家里的少数之个人。使国家富强的也不是实业家，实在是多数的劳动者。我们工业后进国千万不要忘记了这个教训。）”^④在“《社会调查》”一文中又写道：“我向来抱着一种宏愿，要把中国社会的各方面全调查一番。……可以寻出吾国社会上之种种，凡是使人民不得其所，或阻碍人民发达之点，讲求改良的方法。”“司马迁的史记不得不算一部有价值的史书，然而记述人民一般之真状，资料亦非常缺乏。”“三年前北京青年会……曾调查北京城里人力车夫，当时我就着调查的材料作出一份报告，……颇使我猛省，发同情谋救济的方法。但是现在中国的社会调查我以为乡村调查最为重要。”^⑤陶先生还经过调查研究，对于

① 陶孟和：《社会与教育》，1934年3月第一版，第244页。

② 同前书，第1—4页。

③ 《新青年》第五卷第六号（1918年12月15日）。

④ 同上刊，第七卷第二号（1920年1月1日）。

⑤ 《新青年》，第四卷第三号（1918年3月15日）。

当时北大领导人和《新青年》提倡的世界语，提出自己的不同看法，并在通信答辩中最后说，“通信之本意，重在劝告求学若渴之青年，勿浪费宝贵之光阴于不能致用之文字。”^①

以上这些言论表明，孟和先生在民主与科学的旗帜下，思想前进了一大步，他已经具有人民民主思想和调查研究的科学思想，他是心向国家，心向人民的。拿当时胡适的文章来对比一下：胡适抱住实用主义不放，在《新青年》作了介绍，题为《实验主义》；又写了《“新思潮”的意义》，小标题是：“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对于劳动人民，胡适只是对人力车夫写了新诗，表示同情。这样比较一下，可以看出孟和先生在这个时期已经打下了一个前进的思想基础，而胡适不是这样。后来两人所走的道路不同，最后的归宿截然相反，就不是偶然的了。

固然，孟和先生在那时期没有接受马克思主义，因而他的民主思想和科学思想是不彻底的。不过孟和先生是追求真理的，并且强调对中国社会进行调查研究，他会随着时代的前进而前进的。

(二)

如前所说，孟和先生向来抱着一个宏愿，要对中国社会各方面进行调查研究，意图改良社会，利国利民。1926年孟和先生受庚款基金会（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之托，创立了社会调查部，后于1929年改称社会调查所。在这里开始了陶先生指导下的社会调查研究。首先是对我国城市工人的生活费和生活程度进行调查研究。关于调查方法，他认为采用家庭每日记帐法，极其可取，可以得到极精确可靠的结果。按照这个方法，首次在1926—27年间的半年对北平48家，主要是人力车夫家庭，作了记帐调查，其结果（再加上北平的其他两个调查）由陶先生写成《北平生活费之分析》一书。这在经济和文化落后的旧社会，有开风气

^① 《新青年》，第四卷第三号，第五卷第一号。

的意义。当时清华大学教授吴景超对这本书评论说，“本书很可代表中国社会科学界的一种新精神”；又说，“假如我们想看社会科学家笔下的贫民生活是个什么样子，不可不读陶先生这本书。”陶先生还主张，由于北平不是工业城市，这样的调查应该进一步在上海、天津进行。这时又得上海调查物价局的合作，便于1927—28年对上海230家纱厂工人作一年的记帐调查，这是当时国内这类调查当中最大的一个。我是1927年夏到调查所工作的，搞统计。这个调查所得的资料由我主持在所里进行计算和研究，并写成《上海工人生活程度的一个研究》一书。陶先生为书写了序言，其中赞扬上海调查物价局的负责人“盛灼三先生和局中同仁竟能于……公务之外，获得余暇以实事求是的一毫不苟之精神进行这个费时费力而不求人欣赏的全年生活费的调查，供我们的计算研究，实在使我们万分钦佩的。”当时的记帐，有查帐人员随时查看帐簿，遇有不符之处，请记帐人员补查修正，确实是很认真的。后来我们对大量帐簿进行计算，每走一步必须校准后才进行下一步，也就是陶先生所说的“一毫不苟”，否则不能保证结果的准确。陶先生还同南开大学社会经济委员会合作，在1929年对天津缝袜口编织工199家作全年的记帐调查，由南开方面写出报告。

在这些工人生活的分析中，有些结果可以用来作国际的和历史的比较。首先，生活费中食品所占的比重很高，在50%以上，而北平人力车夫的竟达71.2%，同时杂项（特别是其中的教育费）所占的比重很小。其次，食品中各种营养成分的数量也表明当时我国工人生活水平是低的，虽然各地偏低的程度不同。还有，上海纱厂工人平均每日工作时间为10.4小时之多，也算出来了。

此外对乡村农民，调查所自己或同别的单位合作，进行调查。当时也有外国人对我国工人和农村作过一些调查，陶先生认为，我们中国人自己应当作中国的社会调查。调查所随后除继续作工人和农村调查外，把调查研究范围扩大到中国社会、经济的其他方面，如农业、农产品贩运、财政、金融、国际贸易等以及

中国近代经济史。

此外，陶先生还写了一篇文章，题为《一个军队士兵的调查》，登在《社会科学》杂志第一卷第二期。文中写道：“我们意外的荣幸便是现在居然得到一个军队士兵的调查。”这是一个旅的“司令部的王聪之先生在去年里曾编制表格进行调查他的旅内士兵。今年一月间陈翰笙先生到太原接洽并筹备农村调查的时候，得见王先生所存已填写的调查表格 946 份，认为是至可宝贵的资料，当时便想借来供我们的分析与统计。这个要求王先生立刻慨然应允。”

陶先生有时也亲自作社会调查。如1926年夏他由热河乘船至滦县时，见船夫们都是身强力壮的北方人，每天除三餐停船煮食外，终日劳作不息。陶先生与他们交谈，了解到他们每天吃的只是1.4至1.7公斤的小米，配以少许咸菜。他从而计算出这样的膳食每天可供热量五千至六千卡罗里及蛋白质140至160公分。由此他得到启发，并写道：“彼等每日食如是简单而低廉之食品，不但能担任劳苦之工作，且能保持健康之身体，实为一至堪注意之事实也。”^①

在陶先生的推动下，调查所写出的书，首先编为《社会研究丛刊》，其中第一本是《社会调查方法》。这书后来出了第三版，可见社会调查渐为人们所重视。到1930年这丛刊出书14种。还出了《中国经济问题丛书》，这书共出34种。另外还出了书和图表。又编写两次《中国劳动年鉴》。期刊有《社会科学》杂志、《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

在研究方法方面，除了介绍社会调查方法外，陶先生还支持介绍了统计方法。调查所并对统计方法和统计学作了一些研究并发表文章（包括在国外发表的）。此外还用较深的数学方法分析了中国旧社会流行的各种合会的会规，这是陶先生赞同我进行研究的。我于1934年写出《中国合会之研究》一书。书中写道：“其会金之分配，一般人视为神秘”。依靠数学及计算工具，我检查

^① 陶孟和，《北平生活费之分析》，第57页，1930年版。

了多种会规，得到的结论是：“旧式会规，仅做到‘先得会者较后得会者所纳会金为多’的大原则，其他则模糊杂凑，希图简便而已，所谓利率更是无谓”（书中还提出改进旧会规的公式和表）。

陶先生所主持和推动的这些调查和研究，对于旧社会科学文化落后的状况（尤其是社会科学落后），是起了开新风气的作用的。调查研究的结果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取得了当时国民党统治区的较准确的实际资料，并把这些史实保存下来了。同时还培养了一批年轻的、心向祖国、追求进步的社会科学研究工作者。

陶先生在依靠和培养什么样的人来作调查研究的问题上，是有他自己的明确看法的。他在《留学问题》^①一文中说：中国今日最需要的人才是研究深博的学者或专家，并且须是知道中国的。又说，知道中国情形，再出国研究，是开着眼的，是知道取舍的，是将来可以任事的。他强调的，是要知道中国的情形。陶先生本着这样的看法，所招请的调查研究人员首先是国内大学毕业生，经介绍并经过谈话了解，认为可以作这样工作的，才决定聘用，以后是否续聘，每年决定一次。经过几年实际的社会调查研究，这些人初步知道了中国情形，从而心向祖国，并愿扎根在祖国。有些成绩好的被派到国外深造和研究，是带着问题出去的，出去是为了回国后更好地工作。陶先生主要就是依靠这种“知道中国情形”的青年一代工作的。后来虽延聘了不大知道中国情形的留学生，给以优厚待遇，但人数不多，有的来了又走了。到了抗日战争爆发前夕，陶先生因事离开南京（当时社会科学研究所所在南京），委托所里仅有的两位这样的留学生代理所长，但到了日寇在南京投下炸弹后，这两人丢掉职务私自逃跑了。陶先生回到南京后，把全部书籍、刊物、资料等迁往长沙的工作，就是在他培养的“知道中国情形”的这些人的坚决支持下完成的。后来1939年从桂林搬迁到昆明，陶先生只是在远处指挥，完成搬迁繁重工作的还是这些人。这些人在抗战期间仍继续作调查研究工

^① 《孟和文存》第三卷第31—34页，1925年出版。

作。所以陶先生着重依靠和培养“知道中国情形”的人是有远见的，他所以有这个远见，是由于他为国家的利益而着想。

陶先生由大学毕业生中选用调研人员，初时是北大的，随后是清华的，南开的，燕大的，……全无门户之见。他对待青年人，平易近人，心胸开朗，在工作上十分放手，除了必要的指导和有困难时设法帮助以及必要的讨论外，对每人进行的调研工作从不横加干涉，也从不大笔一挥随便删改别人的文稿。这样，大家思想活泼，主动钻研，努力前进，争取作出成绩。这是与陶先生好的思想作风紧密相联的。

诚然，当时调查研究工作的指导思想基本上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这对于调研工作有影响，主要是在选择题目和其着重点以及分析问题上，有不同程度的观点问题；当时研究人员在《社会科学》杂志上初期发表文章讲马克思经济理论的，也只是把它当作各派学说中的一派来论述的。但是随着时代的前进，大家在学习和研究的进程中，或早或晚，都会不同程度地接受马克思主义，并投入革命队伍。陶先生自己也正是这样的。

(三)

从1926年到解放前夕，陶先生是在国民党统治区作社会调查和研究的。在这二十多年里，他坚决不在国民党政府里做官，不参加国民党，不吹捧统治政权。这与胡适等人当时的表现和趋向是全然不同的，结果是胡适等人最后陷入反动和黑暗的深渊，而陶先生走向了光明。这不仅仅是由于陶先生洁身自好，而是如前所述，主要是由于他从“五四”运动开始在革命洪流的推动下，思想已前进到人民民主主义并掌握了调查研究的科学方法，在此基础上继续前进的结果。

我于1940年8月离开研究所去北大任教。在解放战争胜利前夕（约在1948与1949年之交）我在国外，准备回国，接到国内朋友的信，说陶先生坚决不去台湾，迎接光明；随后我又同朋友为别的事查看“五四”运动时期的《新青年》，发现在该刊上陶先

生和胡适发表的文章所表现的思想大不相同。于是我心里豁然一亮，觉得他们两人的归宿截然相反，不是偶然的。现在进一步研究陶先生的著作，使我更加理解他，敬仰他。

陶先生于1923年8月发表一篇文章，题为《怎样解决中国问题》，^①文章结尾写道：“那末，中国的问题应该如何解决呢？我的见解是先求了解……人一定要笑话这个见解过于迂远，以为时局危迫，时不我待，那里还有工夫去求了解。不知世上的事业没有捷路可走的，……有了真的了解就得到真的解决。”（重点号是原文有的）。现在来回顾，“五四”运动时期以后，就解决中国的问题来说，陶先生确是走了迂回的路，但是他终于随着时代而前进了，而且在那段长时间内，他对旧社会的调查研究成果，对社会（特别在科学文化方面），对人民，是有益的，同时对陶先生自己的前进也是有帮助的。他终于看到并迎接中国问题的真的解决——由党领导的人民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来解决。他自己也为人民立了功。

由以上很不全面的对陶先生事绩和言论的回忆，我觉得，他有这样感人的可贵的精神和思想作风：追求真理，随时代而不断前进，为国家和人民，坚持社会调查研究，讲求严谨方法，精心培养心怀祖国的青年调研人员。想到这些，我敬仰他，怀念他，并学习他可贵的精神和思想作风。

1982年12月30日

^① 《孟和文存》，第一卷第43--49页。